

双协简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昌县委员会编

第18期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五日

新昌巨变四十年

新昌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二日解放，到今年五月二十二日已整整四十周年。四十年间，新昌人民已改变了贫困落后的面貌，过上了温饱生活，并开始向“小康”迈进。

一九八八年与一九四九年相比，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均按一九八〇年不变价计算）已从2784万元增为92375万元，增长32倍。其中农业总产值从2676万元增为11668万元，增长3.36倍；粮食（包括大豆）从46290吨发展为123534吨，增长1.67倍；茶叶从466吨发展为5458吨，增长10.71倍；蚕茧从52吨发展为1037吨，增长18.94倍；长毛兔、蘑菇、水产品从无到有，已成为农村新兴产业。

工业生产，已从仅有的粮食加工和零星的手工织布机发展为拥有较正规的机械、轻纺、制药、造纸、建材、食品、农产品加工等一定规模的工业。所产的柴油机、喷灌机、轴承、制冷配件、白厂丝、天坛牌珠茶、兔羊毛衫、各类胶丸等已畅销国内外。工业总产值从3.08万元增为80617万元，增长260多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已由10.4%上升为87.4%。

农田基本建设成就显著。山塘水库蓄水量从9.9万方增为24524万方；灌溉面积从1.27万亩增为17.62万亩，旱涝保收面积达11.68万亩。建水电站233座，年发电9266万度，为全国一百个初级电气化县之一。县内乡村公路从7.3公里增为580公里，乡通公路，有378个行政村通了汽车。

文化教育普及。中学从3所增为39所；小学从318所增为542所；幼儿园从1所增为73所；学龄儿童均可就近入学。医院（诊所）从近十家增为118家，设有床位627张，还有村级医疗点666个，缺医少药的状况有了改变。

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收入增加，生活改善。1988年农民人均收入609.10元，每百户城镇、农村分别拥有耐用消费品：自行车174、111辆，手表292、257只，收录机74、22台，缝纫机84、58架，黑白电视机64、20台，彩电28、1台，电风扇184、91架，人均住房12.7、24平方米。

四十年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的各项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展望未来，前程似锦！（石鸣皋）

县政协召开三届三次会议

3月28日至4月1日，政协新昌县委员会召开三届三次会议。会议听取了屠福浪同志代表中共新昌县委书记宋益康同志的讲话；审议并通过了俞其宣付主席所作的《常委会工作报告》；在列席县人大九届五次会议中，听取并讨论了钱信浩县长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其它报告。

县委领导的讲话，着重从当前经济形势、社会结构多元化的新情况和加强政治民主建设等方面，阐述了人民政协在新形势下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指出人民政协对协调统一各界人士的思想、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祖国的大团结大统一，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俞其宣付主席所作的《工作报告》，在回顾总结一年来工作的基础上，着重讲了在新的一年里，要在促进“治理整顿”发展农业、教育和廉政建设等方面发挥“协商、监督”的职能作用，为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民主政治建设，为发展我县经济作出新贡献。

会议民主空气浓郁，通过讨论、会议发言、对话、提案等方式，就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并作出了有关决议。县委、人大、县府、纪委会、人武部的领导以及俞其宣、张克纳同志出席开幕式和闭幕式，并在主席台上就座。

新昌解放简述

1949年5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21军61师解放新昌县城，同月24日，中共新昌县临时工作委员会进驻县城，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昌县人民政府。从此，新昌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1948年下半年，全国解放战场捷报频传，浙东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新昌与邻县交界地区，先后建立了中共嵊（县）新（昌）奉（化）县工作委员会、中共嵊（县）新（昌）、东（阳）县工作委员会、中共新（昌）天（台）县工作委员会，并分别建立了浙东人民解放军嵊新奉独立大队、嵊新东县“小团结”部队、新天县大队等三支县级革命武装；浙东行政公署嵊新奉县办事处、第九办事处（嵊新东县办事处）、第十办事处（新天县办事处）等三个县级革命政权，相应建立了三块游击区。11月22日的马坑墩战斗和12月1日的澄潭战斗后，除新昌县城和少数集镇以外的广大农村，均成为游击区范围。1949年1月，浙东人民武装和干部近千人在回山会师，成立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欢度1949年春节，声势大振。

1949年2月，以浙东行政公署第十办事处秘书潘景炎为首组成的武工队，在中共台属工委委员、专员丁友灿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新昌县的统战工作，以团结反蒋开明人士、争取瓦解敌军，为解放新昌创造条件。民国新昌县副参议长唐默亭，经武工队多次工作，提出谈判要求，潘景炎陪同丁友灿于3月12日晚，在永宁乡（即永丰乡）大岩岗寺观内与唐默亭作了谈判，唐应承如下四条内容：1、建立联络，提供情报；2、协助解决部份经济；3、解放新昌县时配合行动；4、掌握住所属武装，并先送缴部分枪支。同时，与民国新昌县自卫大队杨桂如等有关人员建立了联系。中共城区临工

委、中共新北区委分界队长江部队工兵连连长及该连班长王槐堂、城区义警队副队长曾伯笙、中队附吕济堂，乡村电话所所长孙绍法等，进行教育，晓以大义，指出光明出路。

二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4月23日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毛主席发出了“宜将剩勇追穷寇”的伟大号召。

5月2日，中共嵊新东县工委开始整军训干；中共新天县工委中的新昌方面的干部和武装在茅洋开展整军训干，作接收县城的准备。

5月17日，中共新天县工委副书记、第十办事处主任章一萍率领所属到达回山，与中共嵊新东县工委书记吕少英率领的“九办”人员会合；潘景炎带领的县武工队和吕品田带领的新北区武工队也先后赶到回山，开始集中整训，学习《约法八章》、《入城守则》等文件。5月18日，丁友灿宣布成立中共新昌县临时工作委员会，吕少英任书记；成立新昌县人民政府，章一萍任代理县长。

（三）

中国人民解放军21军在5月3日解放杭州。该军61师由萧山南下，于5月21日攻占章镇、三界、仙岩、浦江等敌据点。22日晨，解放嵊县，同日傍晚，冒雨挺进新昌县城，新昌宣告解放。

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先头部队一个排持冲锋枪从西门入城。61师师部和181团驻县城、182团驻大明市、183团驻黄泽镇。大街醒目处，都用石灰水刷写标语，作政策宣传。旧县商会所属城区义警队在城中张家祠堂向先头部队缴械投诚。在解放前夕溃逃的“长江部队”工兵连，也在城东天灯壑村向解放军缴

（下转第5版）

解决民国新昌县自卫总队的经过

潘景炎遗作

(一)

1949年5月中旬，正当我们在回山地区集中，学习城市政策，进行部队整编，准备接管新昌县城时，联络员何渭占匆匆到回山，告知“长江”部队准备撤退，县自卫总队附杨桂如准备率领其控制下的部分武装起义，要我们派武装去城边荷花塘村接应。

形势发展极快，我们正准备行动，解放宁波的一路大军过境，先解放了新昌县城。我们进驻县城后的第二天，县长（代理）章一萍派何渭占去荷

花塘一带联系，却没有找到杨桂如部队。后得悉县自卫总队在民国新昌县长兼自卫总队队长陆绍渊的督率下，已全部逃窜去大市聚区结局山一带。

(二)

进城后的接管工作初步告一段落后，县领导吕少英，章一萍等同志立即研究解决逃往结局山一带的残余武装。大家分析研究后认为：继宁波解放之后，敌人退路截断，成为瓮中之鳖，兵无斗志，并且，杨桂如等曾与我党有过联系，部属又多是本县人，有条件争取通过政治方式解决。这对我党、对人民有利，但也应作两手准备。经丁友灿同志同意后，一面派原副参议长唐默亭偕何渭荪去结局山讲解我党政策，要求他们认清形势，自动放下武器；一面调县大队两个中队驻防大市聚、溪西一带，严阵以待。几天后，何渭荪回来反映：和平解决是军心所向，但领导层尚不统一，杨桂如等倾向放下武器，陆绍渊和原警察局长汪葆祺等没有明确态度，大队长陈庭瑞等则反对，企图顽抗到底。差不多时候，接大市聚区委电话，自卫总队的少数武装乘夜间与我县大队的前哨部队接火，经我方打了几颗枪榴弹后退去。情况复杂，时间紧迫。经分析，敌方发生意见分歧，是必然趋势。但杨桂如是实力派，争取政治解

决的可能性还是大的。于是，加派了与杨桂如及其下属军官关系密切的张芬，章尚贤随同何渭荪返结局山，协助唐默亭工作，力争与我们关系密切的下级军官率先领部属放下武器。

(三)

不久，自卫总队士兵逃亡日众。分队长罗李芳、丁锡汉在杨桂如默许下，首先放下武器，而且大部分人自愿回家了。罗、丁率余下十多人带枪械回城。县领导派石被山、何渭占等去拔茅将人员、枪械接回城里。陆绍渊见士兵日益走散，即带少数警卫人员逃往家乡天台；分队长章明华拉了部分武装上山为匪（后被我军击毙）。残部随以杨桂如、陈庭瑞为首，经唐默亭反复做工作，终于同意放下武器。

何渭荪、张芬赶回城里，向章一萍等汇报洽谈情况后，经研究定了两条：一、该部所有官兵自愿放下武器后，既往不究；二、由县人民政府发给证明，资遣回家。资遣费为军官每人银洋五元，士兵每人二元。遣散经费由县商、会吕德扬等筹措解决。何渭荪、张芬带银洋返真诏、结局山，办理造册发放资遣手续。派潘小兆、梁刚、徐成藩、何渭占，夏伟大等同志率领武装乘车前往接收，在沙溪附近上车，当天回县城，共计轻机枪五挺、步枪200多支、枪榴弹筒4只以及短枪、手榴弹、弹药等军用品。在处理接收过程中，陈庭瑞拉走一部分人枪上山为匪（后被捕获依法处决）。六月十天左右资遣工作结束，杨桂如与家在城关的十多名官兵返县城。第二天，章一萍同志和我接见了杨桂如，对他在解决县自卫总队武装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表示赞赏。

相隔六、七天，民国新昌县警察局长汪葆祺前来投诚，编造了原警察局名册，写了移交书，交了一些公文和办公桌等；还交代了藏匿的枪支，在南明小学后面池塘里捞出两箱（13支）短枪（一说是陈氏小学池塘里）。警卫队原侦辑队长王原全也交出手枪三支，子弹三十多发。

解放初，未经一枪一弹解决了民国新昌县自卫总队和警察局的残余武装，对安定社会秩序，巩固人民政权起了重大作用，这是我党的方针政策在新昌取得的重大胜利。

（石鸣皋节录）

争取义警队 稳定工商界

1949年5月22日，新昌县城解放。新昌县城义警队（简称义警队）立即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诚。

当全国解放战争节节取得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行将全面崩溃之际，中共浙东临工委于1949年1月召开第二次会议，提出“大胆向敌人开展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进攻，壮大革命力量，准备配合大军争取浙东全部解放的早日到来。”中共新昌地区的各级党组织积极行动，在国民党驻新昌县城的武装人员中开展工作，争取他们放下武器，弃暗投明，为解放新昌创造条件。

当时，在县城的国民党武装，“有长江部队”某部及其工兵连，有旧县政府自卫大队，有旧县商会所属的义警队。义警队的前身是商团，在抗日期间，做过一些有益于抗日的工作。其人员组成，主要是工商子弟及其店员，他们不领粮饷，只是免征壮丁，在行动上受旧县警察局节制，该局督察员陈洪国兼任队长。组织松散，除执行任务时偶而集中行动外，平时只有一个班轮流驻队，其余各自从事商业活动，与社会有广泛联系。因此，争取义警队，除了几根枪杆子，还关系到一大片工商户。其时，负责新昌统战工作的潘景炎同志，通过舅舅何方正（旧县参议员）表兄何渭荪，同旧县商会副会长、县参议会副议长唐默亭进行了接触。在全国即将解放的胜利形势下，唐要求谈判。潘景炎陪同中共台属工委委员专员丁友灿于1949年3月12日，在永宁乡大岩岗寺观内同唐默亭谈判，唐同意丁友灿提出的四点要求：1、建立联络，提供情报；2、协助解决部份物资；3、解放新昌时配合行动；4、掌握住所属武装，并先送缴部分枪支。谈判后唐信守诺言，向当地人民武装提供了国民党方面的军事情报及银元、药品、布匹等部分经济物资；在义警队上层积极开展活动，针对个别人要拉队伍上山的错误主张，陈述利害，提出“不走为好”，“真要走的话，可以到真诏（唐的老家）去暂时住一下”。

1949年三、四月间，中共新北区委副书记丁毛土和吕志邦，通过吕志邦熟悉的义警

队中队附吕济堂多次同义警队副中队长言伯笙等人接触，要求他们走光明道路，不跟国民党逃跑，把枪支缴给解放军，同人民一起迎接解放。中共城区临工委也派党员王燧耀在义警队中开展工作。王燧耀利用弟弟王燧海在义警队的客观条件，经常同义警队员孔庆槐、张槐林等人接触，并通过他们再去影响其他队员。

临近解放，义警队内部斗争剧烈。兼任这个队中队长的旧县警察局督察员陈洪国一次次通知队员备带干粮、草帽，随时准备去大市聚区结局山。这个队的军事教官章旭东阴谋拉个人势力，一再煽动外逃。个别人拿不定主意，私自去乡下避风。但多数队员有父母妻儿老少，有家产企业，不愿外逃，因此，坚决抵制各种阴谋煽动，决心迎接解放。在解放前一天，旧县政府人员外逃后，担负起了县城的治安任务，在各城门派了岗哨，部分人员佩带红袖布四处巡逻，一直到解放军进城。

5月22日傍晚，中国人民解放军61师冒雨从西门进入新昌县城。义警队部分人员在各城门等候，解放军一进城，就由义警队分队附陈绍修领路到义警队驻地（张家祠堂），解放军的一位干部当即宣布：枪支由陈绍修等人集中保管，人员各自回家安心开店。夜间不要外出走动，以免误会。嗣后按清册，计人员120多人，轻机枪2挺，步枪80多支，短枪15支，子弹4担，由解放军一位科长负责接受，转交唐默亭等三人保管。后来2挺机枪由南区民运工作队潘震接收；其余枪支、弹药由县人民政府警卫队石被山接收。

义警队的投诚，对当时稳定工商界的思想，恢复县城秩序有一定作用。原义警队副中队长言伯笙，参予开创了新昌的电力工业；该队指导员陈伯照开办裕丰亨酿酒坊，后与其他酿造业一起发展新昌酒厂；有的办起了大众面粉厂等。可是由于左的影响，言、陈俩遭到处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过复查，重新按投诚人员落实了政策。言伯笙还被推荐为浙江省第六届政协委员。

（陈一新整理）

我随南下同志到新昌

1949年5月中下旬，解放大军先后解放了绍兴、上虞、余姚，原来驻扎在四明山腹地的中共四明工委工作队，逐步迁移到余姚城近郊的孤儿院。6月上旬一天中午，工作队指导员严行同志陪着两位身穿黄粗布制服的山东同志来看我们，并介绍说，一位是新昌县委副书记王士英同志，一位是组织部副部长王树元同志。当时我们新昌班有我、胡少康、俞慕宣、陈秀璋等十人。这天下午，大家席地围坐，两位王同志态度和蔼谦逊，向我们了解新昌的地理环境、民情风俗，整整谈了两三个小时。这是我头一次接触南下同志。

当时，工作队学员一批批分赴各县。6月9日早晨，指导员通知我并交给我一个封得严实的纸筒，说这是你们十人的干部登记表和入党志愿书，你们到余姚城内，把它交给王士英同志，并跟随他去新昌工作。我们的行装很简单，只有工作队发的一条夹被和自己携带的替换衣服，打成背包，就好了。由于都是年轻人，最大才二十五六岁，而孤儿院至余姚城不过5里地，转瞬就到了。王士英同志他们已整装待发，我们插入了队伍。出余姚城，长长的行列，竟有一百多人，开头是宋宏领导的去嵊县的南下同志六七十人，中间是王士英带领赴新昌的南下同志四十来人，他们所穿的是一色

粗布黄军装，最后是我们杂色便衣十人。队伍快速行进，走得热了，大家解开衣扣，但是途经较大村镇时，立刻传来扭好衣扣的命令，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天近黑，抵达上虞县丰惠镇，我们见到了王超和施义通两同志，他们也将一起去新昌。

翌日，继续行军。一路上王士英同志有说不完的话，询问新昌情况，王超和我们详尽地作回答。傍晚，到达嵊县，丁友灿同志带着一些人迎接我们进城，热情款待。6月11日上午在嵊县休息半天，中饭后，五十多人的队伍又出发了。我们新昌籍的同志，即将回到解放了的家乡，心情无比激动。下午四时左右，行抵县城，过木桥，进北门，昂首阔步，到达先贤祠大礼堂——今县委驻地，两位已先入城的县领导人吕少英、章一萍和其他一些同志，与新到的王士英、王超、王树元等同志一一握手，表示热烈欢迎。当晚大礼堂内举行晚会。我见到一张大标语，上面写着：“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感到惊讶，我们已是胜利者进城了，怎么还是第一步？今天，回顾四十年波涛起伏不平凡的历程，展望今后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而必须继续前进的漫长道路，那时确实只能算是走完“第一步”。

(吕平)

上接《第二版》

械投诚。5月23日晚，61师奉命向奉化进军。当晚打扫了驻地，归还了向群众借用的生活用具。

(四)

5月23日，中共嵊新特派员丁友灿命令新昌县大队挺进澄潭，待命进城，并率领中共新昌县委工委书记吕少英、代理县长章一萍等接管县城人员和警卫队抵达镜岭。5月24日晨，经上任、琅珂、石溪从南门入城。新昌城内各界人士唐默亭、高德藩、梁士茶等百余人，手捧线香，在南门外夹路欢迎，城墙上站满了人群。

入城后，丁友灿、吕少英、章一萍等在先贤祠与中共城区地下党负责人俞渭滨会合。5月25日，接管了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田粮处、地方法院、警察局、看守所和地方银行、邮局、乡村电话所、新昌简师、蚕桑指导站等单位。中共新昌县临工委，新昌县人民政府开始正式办公。同日，丁友灿在先贤祠主持

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吕少英、章一萍、潘景炎等分别在城隍庙、北镇庙、新昌中学等处召开群众大会，讲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号召社会各界安心职守。对新昌解放前夕，逃窜靖局山的民国新昌县自卫总队和少数政府机关人员，一面派人交待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政策，敦促其自动放下武器，一面命县大队两个中队进驻大市聚、溪西一带严阵以待。民国新昌县长陆绍渊带领少数警卫人员逃往天台、少部份人上山为匪外，其余200多人放下武器投诚，由县人民政府发证给资遣散。随后，继续解决国民党留下的零星武装、匪特和散兵游勇，保障社会安定，促进工农业生产，为民主建政、反霸土改揭开了序幕。

(编者：本文根据县党史办陈刚、俞子敏整理《新昌解放》和王伯祥整理《新昌解放纪实》删节辑成)

一个头戴簪帽的青年农民走进新昌县城五峰小学的校长室，当他知道面前正是校长俞渭滨时，轻轻地说出了三个字，“我姓庞。”俞渭滨沉着地打量了一下来人后，说：“我姓鲍，我姓鲍。”暗语一对上，双方都知道了是自己人。

“我们正在等呢，刚好你来了。”

中共城区临工委书记俞渭滨热情地接待了中共澄潭支部的党员周仁千，遂陪他到王燧耀同志家住下。

一九四九年春，几十个身穿灰色军装的武装战士来到了澄潭镇，带队的小吕队长急匆匆赶到四时春饭店联络站找杜毅同志，通知澄潭支部立即派人到县城去取情报。澄潭支部派了党员周仁千执行这个任务。

周仁千怀着初次执行任务的喜悦心情赶往县城。当他来到城门口、大街上看到岗哨和武装军人时，心里不免有点紧张。到五峰小学见到了俞渭滨，他放心了，把小吕队长的信交给了俞渭滨。

第二天下午一时左右，俞渭滨把一小卷打字纸交给了周仁千，并帮他的小纸卷插进簪帽的夹层里。知道周仁千是初次执行任务，告诉他沉着，通过岗哨要若无其事和怎样应付盘查。

这一小卷打字纸是复制的城关详图，详图上注有国民党“长江部队”武器装备、人员编制以及岗哨分布情况；有“长江部队”连长以上人员的职务姓名。

事后我们了解，这张详图是俞渭滨从伪警察局长汪葆祺处借来新绘成的城关详图复制的，又从一个参谋那里套出了驻新“长江部队”这个师的武器装备，人员编制等情况，还由王燧耀同志从旧县商会请客的名单中抄来了连长以上人员的名单。这些都呈现在一张打字纸上了。这一小纸卷有多重啊！她凝结着中共城区地下党员们的艰辛，她寄托着城关人民早日解放的期望。

第二天傍晚，周仁千顺利回来了，我们要他马上回家。同时根据小吕队长的嘱咐，立即另派人连夜过棠村兴善寺转东旺，把这一小纸卷送到小吕队长手里。

新昌张氏

姓氏源流

考之十四

定居新昌境的张氏有五系，四系在宋代，一系在元代。最早的叫“中溪张氏”。始祖张质，钱唐人，官居吴越国银青光禄大夫侍御史。赵宋时，钱俶拟纳款归宋，他是反对派，与黄尚书、叶太傅力谏，钱俶归宋之意已决，不从谏。他怕宋廷加罪，携三子隐居在新昌中溪（现莒根乡）。长子元吉居中溪，后裔分居细深坑、碓下，下小余、龙王塘、梨木等地，现张家店的张氏是此系的十五代孙原辅所迁居；次子元善，迁居莒溪（今东茗乡），再传十六世，分居张家店（诚爱乡）称“九峰张氏”，幼子元哲，迁居宁海里坡。

第二系始祖张珣，字国珍，号尚素，世居四川绵竹。据宗谱载，此人为南宋初宰相张浚之后。张珣为张浚四代孙。珣生于嘉泰壬戌（1202），淳祐庚戌（1250）中进士，开庆己未（1259）任新昌县令，卒于景定壬戌（1262），死后葬新昌，他儿子张晟，生嘉定辛巳（1221），景定间进士，卒咸淳壬申（1272），定居在新昌登俊坊，此系后裔分居于世路、拔茅、盛桥、杜河、央于、王泗洲、琅河等地。

第三系原居西岭乡元岙等地，据《源溪张氏宗谱》记载，此系也源出张浚，系其次子张杓之后。张浚慕南明山之秀，而怀徙居之念，生前曾作过《南岩寺记》，其次子张杓承父志，卜居于县治之东，其第五世崇山徙居于新昌城内，瑞山徙于龟岩（今西岭乡元岙）。瑞山再四传，名星翁者，徙居方山，成为方山派祖。绳翁仍居龟岩，其孙祺、锦、锦，祺称东方祖，后裔分居马家庄、碓下、棠里湾、徐家岙、王潭坪等地，锦称西房祖，子孙分居于茅洋、左纡，后金山，王泗洲等地。

第四系始祖名张公良，青州寿光人，北宋太平兴国中任新昌令，歿于官，葬在新昌。子张俊、张信遂定居新昌。

第五系始祖张鼎新，江西南昌人，元代来新昌任县尉，爱澄潭山水，遂定居于此，现澄潭镇上的张氏族大都属此系。

（潘表惠）

是使后人受到教育，从而明白做丑事，不仅问心有愧，而且总是逃不脱制裁的。

二

清朝新城（今山东桓台县）人耿华平（庭柏）在南方做官，他母亲徐氏，看到当时官场习气不好，就特地写了一首诗寄给儿子：

家内平安报汝知， 田园岁入有余资。

丝毫不用南中物， 好做清官答圣时。

诗写得明白如话，短短二十八字，寄托着一位慈母爱子之心，想见那位母亲教子有方。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贤母，象孟母断机，岳母刺字，千古传为美谈。而不少贤母，对于出任官职的儿子，更谆谆以清廉相告诫，把儿子为官清正、视为自己最大的安慰。象在汉的范滂（孟博）任清诏使时，有意澄清吏治，他所到之处，贪污的官吏都闻风离去。范滂后因党锢之祸被捕，与母亲诀别，她母亲却泰然自若地说：“我听说李膺、杜密、都是当代名流，你能和他们齐名，我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这是一位深切了解儿子事业意义的母亲。又如宋朝的欧阳修，四岁就丧父，他母亲郑氏，总是告诫儿子长大了要象父亲那样做一个廉洁的官吏。后来欧阳修因论救范仲淹被贬为夷陵令，他母亲仍愉快地说：“我家本来是贫苦的，你能安心，我一定也能安心度日。”这是一位深切了解儿子为人的母亲。上面谈到的那位耿华平的母亲徐氏，正是继承了象范母、欧母这样优良传统的又一位贤母。

养廉诗话

林世堂

东汉时，东莱太守杨震，路经昌邑（今山东巨野），县令王密求见。晚上，王密悄悄送上十金，并且说夜里没有人知道。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能说没有人知道？”这一“四知”的故事，知道的人很多。后人为表彰杨震的清白，还在昌邑建了个四知台。

一般廉洁者拒贿，总是强调自身的修养。

认为不受贿，可以表现出自己的清白

德性；而受了贿，则是使自己的德行沾上了污点。可是杨震却是从另一角度出发来拒贿，他接过王密的话，在

“知”上做文章，强调不是无人知，

而是有知者在。古籍中有一个故事：

有人在集市上抢金子，被捉住后，却

说抢的时候，只见金子，不见人。简单

的故事，道出了贪财者的心理。杨震

能看到自己和送金者都是客观世界

中的人，不能自欺欺人。他无愧是一

位具有清醒头脑的唯物主义者。

宋人薛瑄有一首题四知台的诗：

人间无处不天公 却笑黄金蚀夜中。

千载四知台下过 马头犹自起清风！

一个人如果能想到自己生活在客观世界中，事事处处逃不了现实社会的约束，那就会感到象暮夜送贿这样的事，实在是非常可笑的。后人建四知台，在表彰杨震的同时，也就

西南行杂咏

（五首）

赵仁良

参观都江堰

环山古木露初浓
趋谒都江堰水宗
父子伏龙留胜迹
后人继事亦英雄

谒武侯祠

隆中初对匡时策
一试用兵举世惊
耿耿两朝倦国事
悠悠千载颂清明

杜甫草堂览胜

草堂韵事启来人
笔底诗情赋意深
茅屋高吟悲泪曲
千秋绝唱虞民生

上峨眉山

冲开天漏入仙扉
眼底云层贴山飞
梵宇琳宫现胜境
重林寻趣听猿啼

过三峡

船发渝州日正中
夜航蜀道破朦胧
曙光初照巫山峡
越客神驰十二峰

千佛禅院—古元化寺

千佛禅院在新昌城西南大佛寺山中，俗称千佛岩，以千佛石窟而得名，与大佛寺弥勒石像所在的宝相寺石窟山头相邻东西相望。1984年浙江省公布为省文物保护单位。

千佛禅院前身是元化寺。《嘉泰会稽志》载：“七宝院，旧元化寺，东晋高僧于法兰建，曾与石城隐岳鼎足而立。”刘勰《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记了僧昙光在剡山建隐岳寺后说“后兰公创寺号曰元化，兹密迹石城，而拱木高阻，似石桥之天断，犹桃源之地绝。”据新昌县志载，唐会昌五年（845）武宗灭佛，毁千佛院，宋祥符间（1008—1016）改名七宝院，明洪武时（1382）复名千佛院。宋时寺中有佛塔，咸淳九年（1273）新昌县“中乡荐为会稽八邑之魁”，县令谢在杼作题名记，在塔上题名三十四人。后晋开运三年（943），赵仁爽曾经作过重修，清嘉庆元年（1796），宝相寺僧“顺阳携师及徙移锡千佛院”，十年以后，千佛院兴”。从此与宝相寺同宗，宗系也属临济宗。道光十七年邑令朱元亨有《重建千佛院记》，至今文字尚存。

元化寺是东晋名寺，为高僧于法兰所创。法兰弟子于道邃，创缘会宗，于法开创识含宗，为般若学六家七宗中的二宗。当时在寺还有于法威，竺法兴，于法道，支法渊，梁·慧皎《高僧传》中都有记述。元化寺到齐永明三年（485），受北方建云冈、龙门石窟影响，开始建石窟，造小佛千尊改名千佛院，比石城寺筹建石弥勒大像还早一年。千佛石窟建成后与

石城寺石像一小一大，一多一少，一南一北，一上一下相映成趣。

千佛石窟有正、旁两洞，正洞宽18米，深6米，高4—5米，洞口接岩石为阙，有檐角挑出。正面洞壁有小石佛十龕，每龕为10×11小格，每格中一小佛高约20余厘米，中间九格置一尊较大佛像，膝前侍立二小像。每龕实为104尊，横列十龕共佛1040尊，小佛石质外加泥彩，十龕之外两旁有两护卫神像，石质浮雕，衣带战袍身影俱在，像身有不规则小孔数十，似是后世故意凿出借以敷泥彩，今已全部脱落，当时形制毕见，虽多磨损，六朝真迹犹在，文物价值很高。十龕下列石座，有十八罗汉像各高一米另。旁洞宽6米深3米，高5米，壁上及龕前列一米多高的石像十余尊，“文革”时曾遭毁，头部都重补了泥塑。

千佛院在“文革”中曾一度成为生产队养猪场，除石壁龕中小佛像外破坏严重，1982年恢复时，于原石窟东靠山门小空龕中移塑海岛观音像一堂（海岛观音原建在濯濯亭内，在“文革”时被毁）游人多喜欢在此摄影留念。

千佛院座北朝南，位半山上，与坐南朝北处于谷底的宝相寺（今大佛寺）一开朗一沉静正好相反，现在寺稍下处已辟建为县文物仓库，移旧城隍庙古建筑及明·吕光洵尚书墓前石像实其中，还将建碑廊以陈列文物，今后古元化寺必将重放光彩。（陈新宇）

“书画展”延期举行

为了庆祝新昌解放四十周年，县政协曾致函新昌籍书画工作者，倡议举办《天姥山书画展》。这一倡议，得到了各界有关人士的热情支持，到四月底止，已收到作品69件，其中有娄世堂、陈雅丹、俞洋奎、王超等同志的画，赵荆、孙钊、周少颐、周笑樗、王淑君等同志的书法，石观达同志的摄影，他们以自己优秀作品热情歌颂家乡的解放，歌颂家乡四十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

这个展览，由于征集作品的时间较短，装裱等准备工作尚未就绪，经研究延致国庆节前后展出，作品征集，延到七月底止。望能继续得到各界及其书画爱好者的的大力支持。

新昌县政协诸领导：

蒙多次寄来《政协简讯》，十分感激！我对家乡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而自己对家乡的建设未能作出一点贡献，又感到内疚！

来信稿登

《简讯》的每一篇文章，我都认真阅读，特别是我敬爱的老师林世堂委员的文章，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林老师是我在新昌中学读高一时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他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对学生关心爱护，是最尊敬的老师之一。

我老家在通山东旺，57年毕业于华东师大物理系后来江西吉安工作。如有机会回来，一定登门道谢！此致敬礼！

吉安师专 徐一飞